

30YUWEI ZHUMING ZHUANJIA XUEZHE JIANYAN
QUANMIAN SHENHUA GAIGE

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

30余位著名专家学者建言全面深化改革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编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QUANMIAN
SHENHUA GAIGE
RUOGAN ZHONGDA WENTI

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

30余位著名专家学者建言全面深化改革

30YUWEI ZHUMING ZHUANJIAXUEZHEJIANYAN
QUANMIANSHENHUA GAIGE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编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编.
—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5150-0982-7

I.①全… II.①中… III.①体制改革-研究-中国
IV.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1007号

书 名 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作 者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责任编辑 任 燕
出版发行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6号 100089）
电 话 （010）68920640 68929037
编 辑 部 （010）68929095
经 销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开
印 张 15
字 数 2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50-0982-7
定 价 36.00元

目录

一、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起点

- 迟福林 / 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起点 002
- 吴敬琏 / 推进改革对中国性命攸关 007
- 吴敬琏 / 十八大后的中国改革 010
- 张卓元 / 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018
- 巴曙松等 / 中国经济减速的性质与政策选项 025
- 张占斌 / 新市场经济体制与下一个十年 040
- 张立群 / 加快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048

二、进一步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

- 高尚全 / 营造公平市场环境的关键仍是改革 054
- 常修泽 / “天”“地”“人”产权论 058
- 王小广 / 新一轮改革的重点仍然是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074

三、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提高政府效能和效率

- 迟福林 / 尽快改变“增长主义”政府倾向 080
- 汪玉凯 / 大部制改革应如何推进 088
- 竹立家 / “大部制”与政府机构改革 094

四、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为实现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 刘尚希 / 经济体制改革应当转换视角 102
曹远征 / 体制改革是未来经济政策重心 107
贾康 / 财税政策调控与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 112
许小年 / 金融改革的启动路径 115

五、进一步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 陈锡文 / 城镇化过程中的“三农”问题 122
韩俊 / 农村改革关键 138
王一鸣 / 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144
迟福林 / 推进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 149
宋洪远等 / 我国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面临的挑战与选择 155
党国英 / 提高城镇化质量必须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167

六、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制度安排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权益

- 刘尚希 / 共同富裕：深化经济社会改革的方向 174
苏海南 / 收入分配改革要避免“四割裂”、“四对立” 178
王小鲁 / 改善收入分配要靠制度改革 184
杨宜勇等 /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是中国收入分配改革重点 190

七、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

- 汪玉凯 / 我国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 196
范恒山 /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制度的若干思考 206
宋晓梧 / 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211
聂高民 /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214

附录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21

(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一、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起点

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起点

※ 迟福林

我国改革正处于深水区和攻坚阶段。与以往相比，改革的深刻性、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治理转型都直接依赖于重大改革的突破；利益失衡的矛盾突出，改革需要在调整重大利益关系上取得进展；转型倒逼改革，改革的时间和空间约束全面增强。在这个特定背景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制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向人们释放出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推进全面改革历史性新突破的重要信息。

（一）突破利益固化藩篱

坚持富民优先，形成合理的利益结构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起点和重要经验。35年前，正是因为改革打破了平均主义的藩篱，才使得改革能赢得更为广泛的社会支持，进而形成改革的社会合力。35年后的今天，改革在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面临着贫富差距扩大、利益失衡、利益固化的突出矛盾和重大挑战，并且利益固化的倾向与趋势日益明显。面对深刻复杂的利益关系，能不能坚持富民优先的改革导向，大胆稳妥地调整利益关系，尽快扭转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形成合理的利益结构，决定着全面改革的成败。

坚持富民优先，就是把老百姓不断享受到的改革红利、发展实惠的基本原则贯穿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改革的始终，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坚持富民优先。我们说，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还需要进一步改革，重要的是这个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容易形成利益固化和利益失衡。尽管市场化改革会不可避免地导

致利益分化，不可避免地带来利益主体多元化，但公平可持续的市场经济体制恰恰可以促进公平竞争，能够形成平等竞争的竞争规则，能够使更多的人凭借辛勤的劳动、技能的提高向上流动。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坚持富民优先。能否确保经济体制改革的普惠性，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新的要求。这就需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有效约束权力、监督权力、问责权力，提高政府公信力；这就需要优化权力结构，使政府从具体的利益中超脱出来，把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基本职责；这就需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社会体制改革需要坚持富民优先。就是要理顺国家、企业、居民之间的利益关系，打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形成公平的社会环境；就是要在缩小贫富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橄榄型社会新格局上有重要突破，以奠定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文化体制改革需要坚持富民优先。就是要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突破文化供给的体制瓶颈，使文化产业能够发展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成为城乡居民就业和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生态体制改革需要坚持富民优先。就是要适应全社会日益增长的生态环境需求，加快资源节约和生态友好的相关体制机制建设，推进绿色转型和绿色增长，使全体城乡居民享受“青山绿水”。

全面深化改革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坚持富民优先，就是要敢于调整重大利益关系，敢于对包括行业利益、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等既得利益“动刀子”，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就是要破题收入分配改革，努力实现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就是要保障和改善民生，把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更好地结合起来，努力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好新阶段的民生需求，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

（二）全面激发市场活力

35年的改革实践表明，政府与市场关系牵动、影响改革全局。政府与市场关系处理得好，不仅能够保证经济健康发展，还能够带来社会和谐和政治清明。相反，政府与市场关系处理不好，会给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治理转型带来多方面的困难。当前我国经济生活的突出矛盾，在于政府过多的行政干预和

深度介入微观经济活动。这就给新阶段的市场化改革提出一个重大问题：在经济生活领域，是坚持市场主导下政府的有效作用，还是实行政府主导下市场的有限作用？毫无疑问，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需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全面激发市场活力。

以市场化改革为最大红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是通过竞争性的市场体系来实现的。这就需要：第一，以理顺资源要素价格为重点深化价格改革。尽快推进成品油、天然气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加快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全面实行水电气梯级价格制度；建立完善的碳源-碳汇监测与调控机制，逐步扩大碳交易范围，适时建立全国性碳交易市场体制，全面开展排污权交易；建立城乡统一的、同权同价的土地交易市场，使土地价格真实反映市场的供求信息，减少土地价格对投资的错误引导。第二，以利率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为重点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逐步放开存款利率，实现各类市场主体平等获得和使用金融资源。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加快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第三，以推进垄断行业改革为重点扩大社会资本投资。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拓展民间资本投资空间。在铁路、电力、电信、石油、民航、邮政等行业，竞争性环节对民间资本全面放开，自然垄断的环节吸纳民间资本广泛参与；尽快开征垄断利润调节税。第四，以公益性为重点调整优化国有资本配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把公益性作为国有资本配置战略性调整的基本要求，充分地发挥国有资本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的重大作用。

把推进政府转型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在政府转型没有重大突破的条件下，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十分困难的，推进市场化改革也会步履艰难。政府职能重心如果继续放在做大总量、扩大投资上，改变投资主导就很难有实质性突破；如果不改变地方政府GDP竞赛的格局，就很难走出产能过剩、土地财政、债务风险等治理困局；如果不改变政府自身利益倾向，“有形之手”就会产生干预资源配置的内在冲动。这就要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重点加大政府放权力度，简政放权，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充分释放市场活力。与35年前不同的是，当前推进政府转型，关键在于改变竞争性地方政府增长模式及相关的体制机制。以经济总量

为导向、以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和干部考核为约束激励机制、以政府主导和地方政府间竞争为突出特点的体制机制不改变，经济转型难以取得重大突破。这就需要以公共服务为导向改革财税制度和干部考核制度。在理顺中央和地方职责的前提下，促进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力相匹配；在干部绩效考核上，改变“以GDP论英雄”，切实把公共服务实现度和群众满意度作为干部评价、考核、奖励和问责的重要标准。

（三）深化全面开放

从35年改革开放的历程看，以开放倒逼改革是一条基本经验。从现实情况看，新阶段开放倒逼改革不仅远未结束，反而面临着更为艰巨的任务，呈现许多新的突出特点。例如：在外部市场的萎缩将是中长期、并且贸易保护主义再度抬头的背景下，需要改变投资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适应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形势，要把扩大内需、拉动消费作为我国推进区域合作的重大战略；按照增长转型的现实需求，要由过去以制造业开放为主转变为以服务业开放为主。不久前，在上海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施行区内投资贸易便利、货币自由兑换、服务业开放等贸易自由化政策，就是要通过区域内全面的制度创新为我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路子。

以服务业开放带动全面开放。例如，在银行、证券、保险、电信、邮政快递等行业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取消经营范围限制；在教育、医疗、文化等行业扩大开放试点的同时，调整服务业用地政策，创新服务业政策体系。加快实施双边与多边自由贸易区战略。在多哈回合受阻、发达国家急于经济复苏的背景下，推进自由贸易区谈判已成为许多国家的现实选择。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强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为重点，实现与东盟自由贸易的升级。以推动设立中日韩、中韩自由贸易区为重点，在亚洲一体化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争取与亚太国家和地区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取得实质性突破。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的全面合作。以金砖国家为重点，拓展与新兴经济体在双边贸易、能源、清洁能源经济、IT技术发展等方面的全面合作；充分利用新兴经济体合作平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重构，在世界经济再平衡与世界经济秩序重建中发挥更大作用。

（四）推进依法治国

无论是深化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五位一体”的改革，还是推进新的全面开放，都迫切需要法律化、制度化的保障，都迫切需要建设法治政府，都迫切需要建设公平正义的法治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加快法治建设，以法治精神建设现代经济、现代社会、现代政府。

加快形成现代市场经济的立法保障。现代经济是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缺乏法治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不公平，也不可持续。适应形势变化，通过立法规范改革程序，不仅可以有效保障市场公平，还可以有效防止改革的扭曲。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看，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实施仍然滞后。需要通过加快立法，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保障不同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加强以保障公平正义为重点的法治环境建设。现代社会的本质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的本质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改革实践表明，良好的法治环境是社会稳定和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公平正义越来越成为全社会的基本需求。适应这个变化，重在保障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建设。以司法公开为重点加快司法体制改革，完善司法程序，确保法院独立、公正司法有新的突破。通过形成保障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治环境，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供法治保障。

以建设法治政府为目标加强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走向善治的根本举措。只有依法行政，才能真正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形成有效的公共治理。未来5—8年，需要加强包括财政、税收、政府购买、公共资源配置等多方面的立法进程，努力实现到2020年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重要目标。

中国梦是13亿中国人走向共同富裕的梦。过去35年的市场化改革使我国由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处在历史新起点的全面改革，将使一个13亿人的大国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其意义不亚于过去35年的改革。我们有责任为推动这场深刻伟大的改革，主动担当，敢于作为，勇于奉献。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推进改革对中国性命攸关

※ 吴敬琏

2013年6月下旬金融市场发生“钱荒”波动之后，网络上对货币当局对流动性的把握的评论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大多数经济学家从长期进行分析，认为中央银行没有什么错。但是，也有许多网上的评论认为在出现了“钱荒”的时候，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央行在十多天的时间里不施加援手，是政策上的失误。

在发生了短期性流动性短缺的时候，央行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出手，是可以讨论且应该总结的。但是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我们所面临的主要是长期问题。所以，如果仅仅把我们的关注点放在短期货币政策的操作上，可以靠央行“放水”渡过这一次危机，可是由于没有消除产生危机的根源，随时还有可能爆发新的危机。在我看来，这样有可能会放大危机，这就不是中央银行所能解决的了。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的经济增长的模式发生了问题。

经济增长模式问题的提出已经很久。早在1995年制订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中国政府就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依靠投资的粗放发展到依靠效率提高的集约发展的转型。之后的五年计划和规划也都有提到，但始终没有解决，并变得越来越严重。

粗放增长在宏观经济层面造成的问题，是货币超发、债务积累，最后导致宏观经济波动和增长减速。由于没有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每次问题发生以后，采取的措施就回到老路子，用增加投资的老办法来拯救经济。于是，最近五年来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从最微观的层面看，就是我们的资源短缺和环境破坏变得越来越严重，以至于现在维持人类生命的最主要的几个物质

条件，包括空气、水和土壤都发生了问题。

宏观经济出现的问题，是由于债务积累，企业、地方政府甚至整个国家的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过高，以致常常出现或大或小范围内的偿债问题。而宏观经济每次出现这类问题，惯常的办法是采用所谓“中国模式”，也就是威权主义的强势政府去动员资源海量地投入去救市。例如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2009年用4万亿元投资、10万亿元贷款，把GDP增长率拉到8%以上。当时有些人觉得非常得意，说我们率先走出了危机。实际上这是饮鸩止渴的办法，它不但没有降低杠杆，相反进一步杠杆化了。

问题在于即使这种办法也愈来愈不灵了。4万亿元计划把经济拉起来，只维持了不到一年，经济增速就开始连续五个季度下降。2012年5月以后，许多地方又通过政府融资平台，通过各种各样的表外业务、城投债，募集了巨额资金投进城镇化建设。例如西部地区某省的经济正在起飞，近几年每年的基本做法，是依靠作为“发动机”的政府和作为“助推器”的市场，用海量投资拉动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这个省2011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本地GDP的94%，2012年则是本地GDP的114%。根据它的计划，2013年的投资将是本地GDP的120%以上。

而一个沿海的地级市在2012年第三季度提出“大干100天，大投资、大建设、大发展”的口号，组织了18个城投公司，融入巨额资金，进行大拆大建，希望以此来保持经济繁荣。采用这样的方式，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杠杆率就变得愈来愈高。

这些投资中相当一部分是回报率很低、甚至没有回报的，还出现了一些所谓“死城”、“鬼城”。这样，罗伯特·索洛过去讲的投资回报递减的问题就非常明显地表露出来了。2012年下半年的大规模投资，只是把第四季度GDP增长率拉起来0.9个百分点。到了2013年一季度，经济增速又下来了。所以，旧的增长模式和用强势政府海量投资支撑高速度增长的发展路线已经走到了尽头。

另一方面，在杠杆率很高的情况之下，一有风吹草动，某种偶然的原因就会引发资产负债表的危机，也就是局部的资金链断裂传导到金融市场的其他部分，引发系统性危机。现在网上议论得比较多的一种可能的危险，就是

如果美元走强，热钱较大规模地流出，会不会发生像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问题。这使人很担心，只要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一个小火花就会引起严重的问题，而这类偶然的因素几乎是防不胜防的。

那么是不是危机就不能防止呢？当然不是这样。这取决于我们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根本的问题在体制，根本的出路在于改革。

21世纪以来，改革先是放慢，后来在某些方面倒退。于是就出现了对所谓“中国模式”的宣扬。据“中国模式”的宣扬者说，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就是拥有一个威权主义政府，由强势政府而不是市场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支持高速增长。如果这种体制不改变，粗放的发展路线以及资产负债表的高负债率和高杠杆率都是很难改变的。

十八大确定要全面深化改革。现在中国正处在这么一个准备全面深化改革的时机。按照2012年11月十八大和201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制定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

不过我估计，对于一些基本问题，比如我们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国民中，特别在官员中，存在的意见分歧还需要通过自由和切实的讨论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种讨论的结果和据以确定的路线图是不是正确，它的安排是否妥当，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性命攸关。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十八大后的中国改革

※ 吴敬琏

（一）全面深化改革决策的历史背景

在十八大前将近十年的时间，对于中国应该怎么往前走有着很激烈的讨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十八大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

从20世纪后期开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了一种好事和坏事都十分突出的“两头冒尖”现象。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启动了新一轮经济改革。1993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50条”）的行动纲领。从1994年开始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按照这个行动纲领展开的全面的经济改革，使中国能够在20世纪末期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促使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首先，改革解放了民间创新和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过去农民搞一点自留地被叫做“资本主义尾巴”，“跑单帮”做点小买卖叫做“投机倒把”的刑事犯罪，哪有什么创新才能发挥的余地呢？改革以后逐步地把束缚解开了。现在中国有三千多万民营企业；这是多么大的创造力量！

其次，市场化打破了城乡隔绝的旧格局，使原来低效利用的生产资料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土地和劳动，这两个重要的生产要素在旧体制下是禁止自由流动的。市场化改革把这种束缚解除了，就有大量的原来低效利用的农用地和荒地成为城市住房用地和工商业用地，效率就大大提高了。新增城市土地面积比爱尔兰的全部国土面积还大。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有两亿多人，生产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

上面这些因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增添了极大的动力，使我们能够保持三十多年年均近10%的经济增长，使得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此外，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人口上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改革开放的推进，使得我们朝向实现好几代中国人建设富裕、民主、文明中国的梦想前进了一大步。

不过这只是中国故事的一个部分，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个部分。这就是中国改革在进入所谓“深水区”以后，在21世纪初期出现了放缓的现象，特别是在与政府和国有经济相关的领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2003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通过改革来消除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这表明，改革尚未成功，不完善的体制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去完善。

总之，存在“两头冒尖”现象的根源在于：一方面，经济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市场开始在一些领域的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因此生产力获得了大解放；另一方面，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还没有完全实现，旧的命令经济体制的遗产还大量存在，政府和国有经济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强力干预和管控，妨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体制缺陷的存在，导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两个突出的问题。第一，由于“体制性障碍”，使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型变得步履维艰。导致资源短缺、环境破坏、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等问题变得日益严重，这不但使增长难于持续，而且有可能引发社会危机。第二，国家权力对经济活动干预和控制的加强，使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得以强化，贫富差距拉大。

这种双重体制有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一种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消除旧体制的遗产，建立一个在法治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另一种则是强化政府对经济社会的管控，在强势政府的主导下用海量投资支持GDP的高速增长。这种做法尽管从中长期看成本很高且不可持续，但在短时期确实造成了能够振兴中国的假象，得到一些人的唱和，并被一些人曲解吹捧为值得全世界仿效的“中国模式”。尤其是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后，有的发达国家政府对一些可能引起系统性危机的企业采取了暂

时收归国有的办法，防止引起整个经济体系的崩溃。这本来是经济稳定以后就会退出的临时性做法，但一些人却借机宣传：连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像美国都开始学“中国模式”了！

（二）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意义重大

十八大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因为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当前面对的诸多社会矛盾。

到2010年前后，这种国家主义的思潮在某些场合变得相当强势。于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个人们原来以为早已解决的问题重新被提出。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如果仔细观察中国社会，我们会发现2011年这一年社会思潮发生了一些戏剧性的变化。最关键的是真理愈辩愈明。随着靠强势政府、海量投资驱动发展的政策所造成的后果逐渐暴露出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样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推进改革才是唯一的出路。这样，在2011年以后推进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出现了官民之间形成新的改革共识的可能性。

在这种条件下召开的十八大，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做出了正确的回答，这就是要继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十八大闭幕以后，对于其意义，主流传媒有各种解读。但我觉得重要的是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在经济改革方面，十八大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关键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便“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政治改革方面，十八大重申了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的要求：“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治化”。显然，只有全面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才能解决当前面对的诸多社会矛盾。

（三）改革怎样全面深化

宣布决心全面深化改革只是重启改革的第一步。问题还在于解决“改什